

张旭东◎著

历史 如何选择了 中国共产党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

如何选择了
中国共产党

张旭东◎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如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 张旭东著. —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676-3054-3

I. ①历…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研
究 IV. 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5903号

历史如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张旭东◎著

LISHI RUHE XUANZE LE ZHONGGUO GONGCHANDANG

责任编辑: 陈 艳

装帧设计: 任 彤

出版发行: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网 址: <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 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16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76-3054-3

定 价: 38.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 言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来的历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九十五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告诉我们，95年来，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那么，这背后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她一路前行？这种力量又是如何推动着她披荆斩棘、凯歌而进的？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内在历史逻辑。2015年9月9日，王岐山同志在会见参加“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国政要和知名学者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这是中共最高领导层第一次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就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内在历史逻辑。

2006年7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毕业分配至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工作，迄今为止，已有10个年头。这10年里，我一直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与教学，长期担任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一班、中青年干部二班、地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专题班、半年制西藏班、一年制西藏班、新疆地厅班和新疆县处班的主讲老师，先后讲授过《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和优良传统》《建立新中国的构想及实践》《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等专题。另外，我还参加了许多次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和党史阶段的小组

讨论和双向交流活动。通过这些年教学相长的实践活动，我深深体会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各级学员有两个显著的变化趋势：一是年龄结构上越来越年轻化，二是学历和素质越来越高。正因如此，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和中共党史专题课越来越难讲，小组讨论和双向交流课上，学员的发言和提问越来越高深，这些都给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与教学的老师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甚至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从而鞭策着我不断前行，丝毫不敢懈怠。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历届的中央党校学员在读书思考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如何认识”的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名称是如何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夺取全国政权，新中国是如何构建的，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是如何过渡的，“改革开放”是如何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么提出来的，“改革”的内涵是如何演进的，“发展”理念是如何演进的，等等。诸多“如何认识”的答案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合法性，“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是解决中共历史上众多“如何”的一把关键钥匙。通过这把钥匙，打开历史的大门，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画卷就展现在我们眼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历史还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

目 录

第一章 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 “中国共产党”名称是如何提出来的1
- 一、“社会共产党”还是“社会党”1
- 二、何时才有“中国共产党”称谓4

第二章 历史潮流的合力

- 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夺取全国政权7
- 一、前提因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8
- 二、决定因素：得民心者得天下12
- 三、关键因素：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17
- 四、核心因素：坚强团结的战斗堡垒21

第三章 一唱雄鸡天下白

- 新中国是如何构建的26
- 一、人民共和国方案的形成26
- 二、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形成和确立34
-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确立40
- 四、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确立46
- 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和确立50

第四章 历史的“桥”和“船”

-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是如何过渡的60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国实践	60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及原因	63
三、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及其认识	68
四、几点启示	73

第五章 生命线的传承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76
一、强化思想政治宣传及教育	76
二、思想政治工作和中心工作并举	78
三、注意区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思想教育的层次关系	80
四、对当下的启示	81

第六章 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是怎么认识的	83
一、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概念的界定	83
二、没收官僚资本	88
三、小结:对中国共产党这一认识和政策的总体评价	92

第七章 历史的扬弃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对个体、私营经济是怎么认识的	95
一、灭资本主义残余	95
二、允许小私有	98
三、割“资本主义尾巴”	100
四、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私营经济发展的五次大争论	105

第八章 历史的突破

——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政策是如何突破的	115
一、毛泽东时代的政策	115
二、重新确立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	117
三、利用外资政策的最终确立	120

第九章 思想路线的分量

——如何认识实事求是知易行难125

- 一、“源”与“流”125
- 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130
- 三、如何真正做到“实事求是”133

第十章 历史的主线

——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38

- 一、为什么要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38
- 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42
- 三、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中之重144

第十一章 思想的力量

——如何看待今天的“毛泽东热”149

- 一、全球的“热潮”149
- 二、为什么会“热”153
- 三、“热”向何方158

第十二章 基本国策的开启

——“改革开放”概念是如何提出来的162

- 一、“改革”的提出162
- 二、“开放”的提出164
- 三、“改革开放”的提出166

第十三章 历史的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如何提出来的169

- 一、“中国特色”概念的提出169
- 二、“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71
- 三、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73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

第十四章 历史的关键

——“改革”内涵是如何演进的179

一、“改革”连同“开放”上升为国策179

二、从“全面改革”到“深化改革”183

三、从“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186

第十五章 历史的目的

——“发展”理念是如何演进的191

一、从“快速发展”到“可持续发展”191

二、从“可持续发展”到“科学发展”194

三、“科学发展”指导下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196

四、几点启示199

结 语 历史的升华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与优良传统201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党的优良传统的形成201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党的优良传统的传承206

三、社会主义改革与党的优良传统的弘扬209

第一章 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国共产党”名称是如何提出来的

由于早期的共产党人数少且处在秘密状态，第一手资料非常有限，因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早期党组织的考察主要依靠早期共产党人的回忆。当事人的回忆及其回忆录虽然在了解当时的氛围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回忆录特别是离具体事件时间久远的回忆录中难免有错误或误解，甚至存在主观判断造成的偏颇。例如，相当长的时间里把早期党组织名称误以为是“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就是当事人回忆错误所致。近年来，随着一手资料的不断发掘，这些误称才得以澄清。当然，目前学界对于早期党组织的名称问题还有争议，争议主要围绕在“社会共产党”和“社会党”上面；另外，早期党组织何时才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也没有统一的说法。

一、“社会共产党”还是“社会党”

把1920年6月成立的上海早期党组织称为“社会共产党”是源于俞秀松日记的发现。20世纪90年代在上海发现了上海共产主义早期组织成员俞秀松的日记。俞秀松日记1920年7月10日条写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①。日记相对于回忆录应该更加客观、权威，所以一经发现，就被学界广泛运用。新近修订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有这样的描

^①《俞秀松烈士日记》，《上海革命史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

述：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①。但是仅凭俞秀松的一条日记，“社会共产党”就能够成为定论吗？恐怕也值得商榷。首先，俞秀松的日记起于1920年6月17日，止于7月25日，大概一个月左右，这其中除7月10日一篇外，都没有提到“社会共产党”。另外，到目前为止，所发掘的当时的文献资料也没有发现有类似的提法，早期共产党人的回忆录中有“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社会党”的提法，但没有发现“社会共产党”的提法。另外，当时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一提法。

俞秀松的日记可能是一则孤证，而推翻这一孤证的材料（叫“社会党”）则有几条。首先，有一手资料为证。陈独秀于1920年9月在《新青年》月刊上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首次以“社会党”自称。“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发略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②1920年10月16日《申报》，何丰林电，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与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③。1920年10月20的《民国日报》对其进行了转载：昨阅贵报所载，何使专电称，社会党陈独秀，勾结俄党及刘鹤林等，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等语^④。其次，有回忆录为证。张申府在回忆建党初期情况时说道：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② 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③ 《淞沪护军使向北洋政府发电指责陈独秀组织机器工会》，《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④ 《机器工会理事会记》（节录），《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

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张申府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在红楼一层靠东南角的两间房子里），观点一致。他办《新青年》，张申府等人经常写稿……所以陈独秀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不是偶然的。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还没有确定，征求张申府等人的意见。张申府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张申府等人回了信^①。

最后，有背景为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好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始酝酿成立政党组织，诸如俄国的“社会民主党”，美国的“社会党”等。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1919年3月2日，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组织代表共52人出席会议，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两位负责人刘绍周和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的名义，应约出席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分析当时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初期组织，可以看出：这些组织成立初期，人员混杂，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大多都冠以“社会党”的帽子。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经共产国际同意派到中国来帮助建党的维经斯基就曾在移民北美时期（1913—1918）加入过美国社会党，考虑到维经斯基这样的背景关系，在其帮助下成立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名为“社会党”的理由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同时，我们从《新青年》杂志的封面变化也可窥见一斑。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新青年》杂志为其宣传阵地。1920年9月，《新青年》杂志自八卷一号起，封面变成了和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党徽一样的图案。按茅盾的话说：这一期封面上有一个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相握^②。陈独秀等上海的《新青年》同人在与维经斯基接触后，把杂志的封面改成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图案，应该就是考虑到维经斯基和美国社会党的关系。

这以后，我们再联系一下当时的国际背景，俄国革命后，西欧一些社

^①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节录），《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② 茅盾：《我走过的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

会民主党内部开始分裂。这些党内左派纷纷组织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如美国社会党1901年创立，吸纳各种社会主势力，在1910年达到鼎盛时期，1919年分裂为三派，社会党、共产党、共产主义劳动党；英国社会党1919年内部也分裂为共产党和劳动党；等等。在欧美社会党分裂组成共产党的国际背景传导作用下，这势必会给早期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成员带来短暂的选择上的徘徊，这就印证了张申府“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①的回忆。综上史料和背景的考证，我们是不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1920年6月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一开始命名就有“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选择问题，只不过在初期更倾向于使用“社会党”这一名称。通过如此分析论证，我们再看俞秀松1920年7月10日的日记，他用“社会共产党”一词是不是表明早期党组织成员在“社会党”和“共产党”上抉择不定的状态？要不然，这条孤证无法解释。当然，凭此就说明上海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就叫“社会共产党”更加缺乏足够令人信服的说服力。

二、何时才有“中国共产党”称谓

欧美社会党的分裂，共产党的纷纷成立，传导给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势必会引起他们对早期党组织称谓的重新思考。陈独秀1920年8月22日发文指出：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②1920年8月13日，留学欧洲的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道：“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来看，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利的组织。”^③

^①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节录），《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② 陈独秀：《真的工人团体》，《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③ 《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15—817页。

月16日蔡和森又写给毛泽东一封信：“上月寄一长信，大要系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①为了更好地向欧美共产党看齐，实现从社会党向共产党的转型。1920年8月，陈望道根据英、日文本的《共产党宣言》，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译出《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文全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②那么何时实现了这个名称上的转型的呢？

是不是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所描述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就改名为“中国共产党”了呢？这显然也值得商榷。如上所考证，陈独秀于1920年9月在《新青年》月刊上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1920年10月16日《申报》和10月20日的《民国日报》对上海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名称公布的都是“社会党”。蔡和森1920年8月的来信表明的是—种强烈愿望，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要向欧美学习，他们都从社会党转型为共产党，中国应该要走这条路。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才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③。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出《共产党宣言》，也是上海早期党组织为实现转型的准备工作。等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后，曾经一度加入过美国“社会党”并在中国进行建党指导的维经斯基1920年11月7日在《劳动界》上发表《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指出：天下各国的真正劳工农民没有不表同情于劳农议会俄国的……美国劳动（者）已经组织了最大的共产党以作新俄的后援……我们中国劳工农民啊！我们是否要脱离中外资本的压制，是否要免除军阀的痛苦，是否应解放官吏所加的负担，若是我们要脱离这些困苦境遇，就应该劳工农民互相联络起来，然后再和各国劳工农民互相联络起来一齐作俄

①《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19、524页。

②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③《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44页。

国劳工农民所做之事^①。同日,《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刊,李达任主编。《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竖起“共产党”的旗帜。创刊号《短言》阐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产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②。1920年11月《共产党》月刊封面上方以大号字配以英文“The Communist”,实际上这种封面装帧与当时在伦敦刊行的英国共产党的党刊《The Communist》封面非常相似。两者形式如此相似,几乎让人以为《共产党》就是《The Communist》的汉语版^③。从对杂志的封面和形式的模仿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借助于外国的共产党(美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来摸索中国国内未曾有人组织过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共产党”的形态。

这以后,在上海“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其他地方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也纷纷取名“共产党”。“我们和陈独秀互相通信主张各地共产党小组在没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以前,都暂定名为某地区的支部,以便扩展,并正式请求以上海支部负联络全国支部的责任。这种主张得到了各地小组的赞成,中共组织的规模因而略具雏形。”^④张国焘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指出:大约在十一月底,我们的小组正式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⑤。包惠僧回忆1920年秋成立了共产党武汉支部,我记得当时没有小组这个名词,凡经中央组织起来的地方都叫支部^⑥。王翔千在回忆山东共产党的发端时指出:以后在中央专人陈树人(为人)同志指导下成立“共产党山东支部”^⑦。这些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称谓的由来及时间。

① 吴廷康:《中国劳动者与劳动议会的俄国》,《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② 《〈共产党〉第一号短言》,《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③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④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节录),《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页。

⑤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节录),《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页。

⑥ 包惠僧:《创党的开始及武汉临时支部》,《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43页。

⑦ 王翔千:《山东共产党的发端》(节录),《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36页。

第二章 历史潮流的合力

——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夺取全国政权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从1927年以后也是局部执政的过程。有三次政权建设的实践，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同国民党政权根本对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实行“三三制”议会民主的抗日民主政权，这是局部执政的一次成功尝试。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时期，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为中国共产党全国范围内执政作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①。因此，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经验，也是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②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这其中的经验包括领导经验、管理经验、组织经验、军事经验等值得我们去重新梳理、总结并汲取。

① 李君如：《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一、前提因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中国共产党能战胜强大的国民党，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进行理论创新，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施拉姆教授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①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传播到中国的。它的传入实际上也是五四时期“西化论”背景的产物。在此背景下，从一开始党内就存在着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即“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助”，即中国革命“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②。“一切均借俄助”的结果就是强调中国革命必须“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在中国实行僵化的“左”倾土地政策、阶级政策、经济政策和军事战略，并在党内实行派别斗争，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失败和挫折。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回忆道：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你说开除了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面对共产党人由于教条主义领导而造成的惨重失败，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要求反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愿望。实际上，这种愿望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开始。1930年初，毛泽东针对党内教条主义，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

^①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著，田松年等译：《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②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广东群报》1921年1月19日；《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